

講學與政治——以明代北京的講學為例

翁健鐘

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翬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遠漸疏，並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仇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為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伏讀御題朱弁《曲洧舊聞》，至遺憾於洛黨；又御題顧憲成《涇皋藏稿》，示炯戒於東林，誠洞鑒情偽之至論也。

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明黨，明黨始終於講學，講學則始於東林。¹

明代陽明學講學的活動近年來逐漸受到學界的注意。由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等大型文獻叢書的出版，對明人文集的檢索比過去方便許多，藉由第一手史料的閱讀，對明代思想的研究開始能夠超越黃宗羲《明儒學案》的框架。²其中「陽明後學」的研究甚為發達，³而在嘉靖萬曆年間極為發達的王學講會活動也被學界所重視。⁴但就現有的研究來看，皆偏重在分析陽明後學的具體思想內涵以及陽明學講會

¹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七。

² 例如：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清華學報》31：3（2001），頁339-374，即透過周汝登個人及時人的文集，證明了周汝登在學派畫分上屬於王良的一派。過往學人對《明儒學案》學派劃分確有少不爭議，但彭著的貢獻在於其擺脫了過去執著於心性問題的糾纏，直接以當時相關人士的看法來說明周汝登的學派歸屬，論證極為清楚而具說服力，並進一步討論了黃宗羲何以要如此劃分，此種劃分與清初思想氛圍間的關係為何。

³ 近年來出版的專書即有：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吳震，《陽明後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彭國翔，《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陽明學的展開》（北京：三聯書店，2005）。有關陽明後學的研究概況可參見：錢明，〈陽明後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5輯（2005）。

⁴ 例如：陳來，〈明嘉靖時期王學知識人的會講活動〉，《中國學術》第四輯（2000）；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

的社會基礎，對於講學與政治的關係則較不注意。這種強調社會史和思想史結合的研究取向，儘管未必有意識，但其實同時也呼應了美國漢學界對宋代士人「轉向內在」的說法，即在南宋以後，士人對全國性的政治事務漸不感興趣，而將眼光轉向地方，致力於鄉里社會。⁵

余英時先生近年來的新著《朱熹的歷史世界》⁶出版後，在學界引發熱烈的討論。余著極重要的貢獻即在由政治文化的角度來重新解釋宋代道學，強調理學家的政治角色。他強調「得君行道」仍是南宋理學家的崇高理想，政治關懷對理學大夫仍有重要意義。⁷

在這樣的思路下，本文試圖以明代北京的講學活動，來說明明代士人講學活動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二

陽明學生在京師講會的紀錄極早，且可追溯至陽明在世時，即有意派遣學生至京師，趁士子咸集之時宣講其說。

丙戌（嘉靖五年，1526），士復當試禮部，文成命公（王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樸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覲試，任子咸集，念非子莫能闡明之，故以屬子，非為一第也。」公曰：「諾。此行僅了試事，縱得與還，尚不廷試而歸卒焉。」文成曰：「是惟爾意。」乃覓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有及試事者，曰：「業已任之矣。」及抵都，歐陽南野宗伯、魏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辯證，由是公名盛一時。⁸

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張藝曦，《王學、家族與地方社會——以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

⁵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當為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⁶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2003）。

⁷ 余英時後來為文〈明代理學政治文化發微〉，指出自明中期王學興起後，士人由原先的「得君行道」轉為「覺民行道」，尋求在鄉里地域的經世濟民之道。

⁸ 徐階，〈龍溪王先生傳〉，收入：王畿，《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附錄四，頁823-824。

這種於京師講學的活動，至嘉靖年間徐階（1503-1583）入閣時，於靈濟宮講學達至最盛。《明儒學案》稱其「學徒雲集，至千人」「為自來未有之盛」。⁹

徐階是明代嘉靖隆治年間的重要政治人物。對去對徐階的研究並不多，且多集中在其政治活動，特別是其與前後首輔嚴嵩（1480-1567）、高拱（1512-1578）、張居正（1525-1582）之間的關係。¹⁰但徐階除了官僚身分外，同時也是個陽明學的信徒，其與聶豹（1487-1563）的關係介於師友之間，在任首輔時，推廣講學不遺餘力，並為《王文成公全書》作序並予刊刻。

徐階與聶豹的相識是在正德十五年聶豹以進士知華亭時，徐階時為諸生，豹試而奇之，啓發以良知之學，兩人就此結成師生之緣，日後更為同僚。¹¹

徐階正式地登上政治舞臺，應是嘉靖九年（1530）之時。其時張璁（1475-1539）上疏請更定祀典：「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后，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之後更進一步主張「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¹²徐階上疏力陳孔子之號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請孔子封號、文廟像等沿祖制如舊。¹³這次的上疏觸怒了世宗，被貶為福建延平府推官。其後多年於外地任官，歷任延平府推官、黃州府同知、浙江學政、江西學政等。

在這外放的幾年間，徐階推廣講學活動不遺餘力，任延平府推官時，提學副使潘潢邀其講學，約其「為正學書院之行以成端俗正物之化」，他以「已學未成」婉拒。¹⁴但至提督江西學政時，於會城南昌建陽明祠，與歐陽德窮究心學，並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群其中，名曰龍沙會。¹⁵這個講會的影響力在當時頗大，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魏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皆有參與。¹⁶徐階也由這幾年的講學活動中與陽明學士人建立了關係。

⁹ 黃宗羲，《明儒學案》（收入《黃宗羲全集》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七、八冊），卷二十七，〈南中王門學案三〉，頁716。

¹⁰ 參閱：姜德成，《徐階與嘉隆政治》（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這是目前唯一一本有關徐階的專著，由書名即可知作者用力之所在。

¹¹ 聶豹，〈徐公新祠記〉，《聶豹集》，卷六，頁136。

¹²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五十，〈禮志〉四，頁1298。

¹³ 徐階，〈論孔子祀典〉，《世經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集部79-80冊），卷六，頁40-43。

¹⁴ 徐階，〈復潘樸溪提學〉，《少湖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80冊），卷五，頁24-25。

¹⁵ 李春芳，〈重修陽明先生祠堂記〉，《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四庫存目叢書》集部113冊），卷三，頁7。

¹⁶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三十六，〈年譜附錄一〉，頁1334。

至嘉靖十八年（1539），徐階以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返京，返京後與鄒守益、羅洪先、端曉、趙時春、唐順之等人交往，切磋身心之學，為學益切。¹⁷

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階入閣。三十二年（1553）年會試，各地應試士人咸集京師，遂有靈濟宮大會。靈濟宮為北京城西城的道觀，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供奉二徐真人（五代徐知證、徐知誥）。¹⁸

嘉靖二十三年（1544）舉人羅汝芳入京參加會試時，即「同波石徐公、中溪顏公、西石王公、夢坡赦公、二華譚公及諸同志大會於靈濟宮。」¹⁹

在靈濟宮講會之前，王學士人在京城即有不固定的講學活動，據宋儀望的回憶，「嘉靖初，士大夫仕于兩都者，則又聯屬同志為會，會必根極先生（按指王陽明）緒言，而各發明之。」²⁰

如嘉靖十一年（1532）方獻夫即在京城與同志相會，自王陽明歿後，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遭罪譴，京師諱言學。方獻夫（時任吏部尚書）同歐陽德、程文德、楊名、黃宗明、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四十餘人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²¹

嘉靖二十六年（1547），宋儀望中進士，時歐陽德為禮部侍郎，在京亦舉行同志之會：

予自丁未登第，則有若南野歐公為禮侍，與諸同志為會，辯論初劇，至日晡不暇休。²²

相對於這些王學人士所辦的同志之會，靈濟宮講會在規模要大上許多。據《明史》所記：

當是時，德與徐階、聶豹、程文德並以宿學都顯位，於是集四方名士於靈濟宮，輿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都城講學之會，於斯為盛。²³

據羅汝芳的經歷：

癸丑，廷試中試。時內閣存齋徐公、部院雙江聶公、南野歐陽公、儼山周公，皆以興起斯學為己任者，乃定會所於靈濟故，師集同年桂岩顧公、近麓李公、洞陽柳公、望山向

¹⁷ 王世貞，〈存齋徐公行狀〉，《弇州山人續稿碑傳》（《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154冊），卷一百三十六，頁327。徐階，〈明故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為陽周公墓志銘〉，《世經堂集》，卷十六，頁45-47。

¹⁸ 《明史》，卷五十，〈禮志〉四，頁1306。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48冊），卷四，頁47-48。又，《明史》卷二百九十九載：「禮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誥、知誥，其神最靈。帝命往迎其像及廟祝以來，遂建靈濟宮於都城，祀之。帝每遭疾，輒遣使問神。」

¹⁹ 曹胤儒，〈羅近溪師行實（節錄）〉，收入：羅汝芳，《羅汝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附錄一，頁835。

²⁰ 宋儀望，〈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華陽館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16冊），卷二，頁1。

²¹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三十六，〈年譜附錄一〉，頁1329。

²² 宋儀望，〈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華陽館文集》，卷二，頁1。

²³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歐陽德傳〉，頁7277。

公、一吾李公，會試同年昆湖瞿叔、澤峰吳公、渾庵戴公、少龍賀公、敬所王公，舊同志善山何公、西吾張公、吉陽何公、浮峰張公、芳麓王公數十百人，聯講兩月，人心翕然，稱盛會也。²⁴

嘉靖三十五年（1556），又舉行了一次靈濟宮講會，這次羅汝芳趁入覲時還邀請了他的老師顏鈞一起來北京參加：

又被近溪令太湖，入覲，忽遇江東門，苦板同早程，敘間闊。鐸不忍堅拒，隨至北畿。時徐少湖名階為輔相，邀鐸主會天下來覲官三百五十員于靈濟宮三日。越七日，又邀鐸陪赴會試舉人七百士亦洞講三日。²⁵

按顏鈞所記這次會的規模也頗大，但頗堪玩味的是，黃宗羲卻認為「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為之一空」，²⁶且《明儒學案》中涉及靈濟宮會者對顏鈞皆隻字不提。這未必是黃宗羲的門戶之見，在《羅汝芳年譜》中，對顏鈞主講靈濟宮會之事，也找不到相關記載：

歲大計，入覲。大學士徐階曰：「……。」汝芳起謝。……因謂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今天朝可以講學，以趨端向。階遂大會於靈濟宮。汝芳娓娓發明，聽者數千人。²⁷

故此事很可能是顏鈞的自誇之詞。

這年除了靈濟宮講會外，同志會也復行：

丙辰冬，永與沃洲呂君相遇于淮，慨然以斯會散落為念。至則吉陽何君為太僕當卿，乃與羅子惟德、胡子正甫、鄒子繼甫輩復訂前會，自卿寺以下，常至六七十人，而又間為小會，則惟予與何、呂二君，企二三子也。²⁸

這個較為小型的講會正是沿續嘉靖二十六時年歐陽德所主辦的同志會。

嘉靖三十七年（1558），在何遷的鼓倡下，又再次舉行靈濟宮講會，但這次的聲勢弱了許多：

戊午歲，太僕少卿何遷自南京來，復推階為主盟，仍為靈濟宮之會。乃遷名位未可恃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²⁹

²⁴ 曹胤儒，〈羅近溪師行實（節錄）〉，頁836。

²⁵ 顏鈞，〈自傳〉，《顏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卷三，頁23。

²⁶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七，頁716。

²⁷ 《建昌府志》，卷八，〈羅汝芳傳〉，轉引自方祖猷，〈羅汝芳年譜〉，收入《羅汝芳集》，頁897。

²⁸ 宋儀望，〈贈大理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華陽館文集》，卷二，頁1-2。

²⁹ 徐學謨，《世廟識餘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49冊），卷二十一，頁14。

由此可看出靈濟宮講會的一個限制，由京城高官來推動雖可號召許多人，但來參加者的心態卻未必是誠心向學，有些僅是以此做為晉陞之階。這種趨鶩的現象在萬曆時即有人批評：

嘉靖末年，徐華亭預以首揆為主盟，一時趨鶩者，人人自託我道，凡撫臺蒞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為中丞行臺矣。³⁰

靈濟宮講會的最後一波高峰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時徐階已任首輔，政治聲望如日中天。羅汝芳入覲時，徐階詢以時務，對曰：「人才為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於是聯會靈濟宮，聽者達數千人之多。

當時的場面極為隆重浩大：

是春，外官入覲。徐存齋公倡集百官，大會于靈濟宮。外官自方伯而下，列左于堂之左西向，京官自亞相李石麓公而下，列左于堂東向，士人以會試到京及庠生皆得赴會。³¹

此次盛會徐階本人因在值宿供寫青詞不克前往，手寫程子〈定性書〉一書及〈學者先須識仁〉二篇，由其子攜至會所，與會者諷咏而商榷之。³²徐階就會中所疑問者，一一批示答問，寫就一篇〈教言〉。羅近溪錄下此文，攜到南京，交給耿定向，王畿就是在南京的講會中讀到徐階的教言，盛讚其「一時風動之機，殆遍寰宇，明道術、正人心，是大有功於名教也。」³³

隆慶二年（1568）時，歐陽紹慶（歐陽德次子）亦舉辦過一次靈濟宮講會，但只有同志數十人參加而已。³⁴這年徐階亦因屢次進諫而漸失隆慶意，給事中張齊等揭發其當年襄贊嘉靖神仙土木之事，徐階請辭獲准。³⁵

時至萬曆以後，政權的重力轉落至張居正手上，張居正素不喜講學：

夫昔之為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啞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蟆禪耳。而其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丑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

³⁰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二十四，頁1607。

³¹ 王時槐，《王塘南先生自考錄》，嘉靖四十四年條，頁21。轉引自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頁266-267。

³² 曹胤儒，〈羅近溪師行實（節錄）〉，頁839。李春芳，〈存齋先生教言序〉，《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五，頁1。

³³ 王畿，〈跋徐存齋師相教言〉，《王畿集》，卷十五，頁412。

³⁴ 胡直，〈歐陽乾江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287冊），卷二十四，頁6-7。

³⁵ 有關徐階請辭之始末，可參見姜德成，《徐階與嘉隆政治》，頁323-337。該節有詳細的討論。

深被其禍，今猶未殄 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

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樹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于所詆之下。將令后生小子何所師法耶？³⁶

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附麗之者，競依壇坫，旁暢其說，因借以把持郡吧，需索金錢，海內為之側目。張文忠為徐受業弟子，極恨其事，而謗議之。³⁷

總之，張居正的權位日重，反對講學的勢力也開始隨之高張。其實自嘉靖後期以來，主張講學與反對講學的言論已隱然分成兩陣營，相互對立，最著名如張岳即上疏批評：

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功名橫於胸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穀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諫則羨卿貳之崇高。以為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然後剿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 相邀以聲譽。初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聖人面貌，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得為會中人物耳。」……興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覘喜怒于上官，定進退之秘訣；或騰毀譽于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間為堅白異同之談，各質己私，嘵嘵不相下。……今群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贄于師弟，又非相契于朋儕，豈宜群蒼州處，十五成群以惑眾聽善乎？³⁸

這鼓反對講學的言論一直都在，張居正並非首開其風者，但與其他反對講學者不同的是，隆慶年後，他身處權力核力，可以申張己意來打擊士人的講學活動。

萬曆二年（1574），宋儀望陞大僕寺卿尋轉大理寺少卿，率諸縉紳偕諸覲臣講學靈濟宮。其時學禁趨嚴，王陽明從祀的問題正引起爭論，聚訟紛紜，莫口一致，³⁹宋儀望寫就〈陽明先生從祀或問〉。⁴⁰但該年王陽明並未入祀，直至萬曆十二年（1584）王陽明方與陳獻章、胡居仁一起從祀孔廟。

萬曆五年（1576），京師的講學活動開始有所避忌，王畿云「京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已久。今因時好差池，漸成避忌。」他寫信給沈懋學，敦促其恢復講學：「所云月會之議 還望終始自

³⁶ 張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張太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二十九，頁27-30。

³⁷ 沈德符，〈嫉諂〉，《萬曆野獲篇》，卷八，頁215。

³⁸ 《明世宗實錄》，卷五百四十一，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壬申，頁8747-8754。

³⁹ 有關陽明從祀所引起的爭議，可參見：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收入：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國史釋論》下冊（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頁567-581。

⁴⁰ 胡直，〈大理卿宋華陽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續稿》，卷六，頁7-8。

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飾門戶，求以矯抗於時也。」⁴¹

同年，張居正奪情。這件事是張居正和講學學者分道揚鑣的重要轉折：

昔年相君遭喪，二三士紳倡議相君以□，少而讒者因乘間譖言：倡此議者盡是講學之党。相君稍稍蓄疑，而讒者益構之。以此，相君謂：吾方欲振紀綱而講學者見以為申韓操切，吾方欲致主安富而講學者見以為管商富疆，吾方忘家以殉社稷而講學者又見以為貪位遺親。是今之講學，皆迂偽取名，即昔之橫議亂天下者。⁴²

萬曆七年（1578）對講學活動是一個重大打擊，由於前常州知府施觀民科徵民力作書院，張居正擬旨天下書院私建者俱改公廡。⁴³

靈濟宮講會之事在明代極為轟動，徐階先後以次輔及首輔的身分主持，吸引上千人次參加。後來天啓年間鄒元標與馮從吾首善書院講學時，也以此事作為其倡講學的根據之一。即便對徐階評價不高，認為其「純以機巧用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的黃宗羲，也稱徐階「為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為自來未有之盛。」⁴⁴

三

清代的碩學大儒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留有一則小故事：

裘文達公言：「嘗聞諸石東村曰，有驍騎校頗讀書，喜談文義。一夜寓直宣武門，城上乘涼。散步至麗樵之東，見二人倚堞相對語，心知為狐鬼，屏息伺之。其一舉手北指曰：『此故明首善書院，今為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其教則變換佛經，而附會以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迄不能行。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其一曰：『君謂其黠，我則怪其太癡。彼奉其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欲化中國為彼教。揆度事勢，寧有是理。而自利瑪竇以後，源源續至，不償其所願終不止，不亦僨乎？』其一又曰：『豈但此輩癡，即彼建首善書院者，亦復

⁴¹ 王畿，〈與沈宗顏〉，《王畿集》，卷十二，頁328。

⁴² 耿定向，〈與劉養旦〉，《耿天臺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31冊），卷四，頁50。

⁴³ 談遷《國權》，卷七十，頁4340。

⁴⁴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二十七，頁715-717。

大癡。姦璫柄國，方陰伺君子之隙，肆其詆排，而賤聚清談，反予以脇當之題目，一網打盡亦復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則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與講肆者公孫丑萬章等數人而已。洛閩諸儒，無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萬，梟鷲並集，門戶交爭，遂釀為朋黨，而國隨以亡。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驚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鏹，能無責備於賢者哉。」方相對嘆息，忽回顧見人，翳然而滅。」東村曰：「天下趨之如鶩，而世外之狐鬼，乃竊竊不滿也。人誤耶？狐鬼誤耶？」《閱微草堂筆記》，頁3433-3434。

這則故事收入《如是我聞》中，作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距明亡已超過一百年了。天主教堂的取代首善書院，故有其象徵上的意義，而晚明盛極一時的講學運動在此盛清之時也已風流雲散俱往矣！

「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驚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鏹，能無責備於賢者哉。」雖是鬼狐之言，姑妄聽之，也能見得幾分清代已大為不同的士風。

首善書院的講學，在晚明極為轟動一時。其間涉及了時為都察御史的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及首輔葉向高等人。

鄒元標為江西吉水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旋因進諫張居正奪情一事而成名，被廷杖謫戍貴州都勻衛，此後仕途並不得意，後因母憂而歸，里居講學三十餘年。⁴⁵羅洪先逝世後（1564），他可視為吉水地區的講學領袖，吉水具代表性的瀧江、仁文兩書院即由其主持。⁴⁶

馮從吾則是陝西長安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因上諫而觸怒神宗，外放南京，不久即辭官返鄉，家居講學十餘年。⁴⁷他是關中地區的講學領袖。

講學活動剛開始時，是借京師附近的城隍廟進行的。馮從吾〈都門語·序〉：

京師舊有講學，會月凡三舉，自余壬辰請告歸，而會遂輟不講者三十年矣！歲辛酉秋，起官京師，而南臯鄒公、晉菴楊公、瀘水鄒公、景逸高以、少原余公、真予曹公，亦先後至，其他同志雲集，相得甚歡，因約會講學於城隍之道院，逢三為期，俱薦紳先生；又增一會，逢八為期，凡舉監生儒布衣皆與焉。中午而集，酉初而散，我存李公，所謂「人人可來，多多益善。」……嗚呼！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京師首善之地，乃四方之所則倣者也。今各省俱有學會，而京師獨無，其何以為四方倡？況今值國家多事之秋，正當講學以修文德，使首善之地，有唐虞三代之風，其於世道人心，豈曰小補之哉！⁴⁸

⁴⁵ 《明儒學案》，卷二十三，〈江右工門學案〉八，頁617-619。

⁴⁶ 關於鄒元標與吉水地區的講學活動，參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頁159-179。

⁴⁷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甘泉學案〉，頁984。

⁴⁸ 馮從吾，〈都門語·序〉，《馮少墟續集》（收入：《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1997〕14冊），頁697。

自萬曆二十年（1592）後京城再沒有講學活動了。這並不難想見，萬曆二十一年內閣首輔王錫爵與吏部尚書孫鑰相抗，主持考察的孫鑰盡黜執政私人，令王錫爵大為不滿，導致閣部、朝野互相批論，此後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及三年一次的外察皆為政壇派系的攻訐焦點，也是各黨勢力消長的關鍵，尤以萬曆三十七年（1609）的李三才事件以及萬曆三十九年（1611）的辛亥京察為最。⁴⁹處於此種風雨欲來的氣氛中，要在京城辦講學是有極大困難的。

而參與城隍廟講學的士人也都有其背景，除前述鄒元標主持江西吉水書院，馮從吾主持關中書院外，高攀龍是東林書院的要角，余懋衡則主持徽州紫陽書院，在「各省俱有學會」的主事人群聚京師，成立了首善書院「為四方倡」，這是很具有象徵意義的一件大事。⁵⁰

天啓五年，御史張訥奏毀天下講壇提及：「計海內為書院者，其最盛有四：如東林、如關中、如江右、如徽州，不為不多矣。若輩以為散處於野，未若彙集於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故實逼處此，與皇上爭統一之大權。……蓋今日之邪黨雖斥，而南北主盟互相頑長，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尚無羞也。」⁵¹張訥所稱的四個書院，其主事者皆參了首善書院講學的活動，可見這個書院在當日受到注目的程度。

事實上，要在京師成立書院講學，並不是沒有反對聲浪的，當時初任御史的黃尊素即直言規諫：「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⁵²

成立之初，以鄒元標和馮從吾兩人主講，兩人之學術風格並不相同：

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證，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其境地所詣，似若併禪機玄旨而包括于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超，又若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于規矩準繩彝倫物理尺寸寸，不少逾越，與世之高譚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⁵³

而在講學內容上，則約定：

約會講學於城隍之道院……是日也，不設酒醴，不用東邀，不談朝政，不談私事，不談仙佛，千言萬言語，總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及高皇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言。

⁴⁹ 有關萬曆年間的京察與言官論爭情形，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19-30。

⁵⁰ 小野和子提出「書院網絡」之說，認為當時逐漸形成全書性的書院網絡，首善書院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見：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李慶、張榮涓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57-162。

⁵¹ 《明熹宗實錄七年都察院實錄》，天啓五年八月八日，頁1138-1139。

⁵²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⁵³ 葉向高，〈新建首善書院記〉，《馮少墟續集》，頁776。

原先有意參加的鹿善繼就曾對講學的內容有所批評：「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用之人矣。」⁵⁵，遂決定不往。

但即便在他們如此緊慎小心不要與政治局勢扯上關係，書院成立不久後，即有科臣上疏指摘，最主要為朱童蒙、郭允厚及郭興治。

天啓二年九月庚子，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上疏攻擊鄒、馮：

兵科部給事中朱童蒙以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等於都城創建講堂，恐開門戶，疏請極行禁諭言：昔在皇祖時有理學之臣顧憲成、郭正域開講東林，其初亦以發明聖賢蘊奧，開示後學，豈不甚善？建從遊者眾，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東林之徒以自矜諍，甚至學士儒主挾之以扞文網，冠裳仕進借之以黨援。……二臣一旦復為擇地建壇，招朋引類，況又在皇都之內，賢否輻輳之處乎？臣謂今日之人心猶昔日之人心，將來今日之講學猶今日之講學者也。⁵⁶

在其上疏後不久，鄒、馮兩人即上疏辨解，鄒元標舉了隆慶時徐階講學的前例：「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⁵⁷馮從吾則更是氣壯直言：

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⁵⁸

天啓二年十月，工科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再度上疏攻擊，但此次講學之事只是上疏的藉口，真正的焦點都集中在鄒元標身上，牽涉到他在當時幾個政治事件中所持的立場。郭允厚丁卯疏云：

講學要在體認，乃憲臣之體認，何如也？爰書欲就，堂上投筆而問彌佗，訊語未畢，簷下笑語而談世家。語言文字之外，致兩臣各去其官。後先遲速之間，令諸賢不安其位。

⁵⁴ 馮從吾，〈都門語·序〉，《馮少墟續集》，頁697。

⁵⁵ 黃宗羲，〈諸儒學案下二·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明儒學案》，卷五十，頁。

⁵⁶ 《明熹宗實錄》，卷二十六，頁1302-1303。

⁵⁷ 鄒元標，〈陳共學之原以定眾志疏〉，《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25-26。實錄亦收有此疏，但內容未及《鄒忠介公奏疏》所錄完整，故以下鄒元標疏皆引自《鄒忠介公奏疏》。

⁵⁸ 〈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疏〉，《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28。

遙望奴鋒之慘目，方欲更畿輔以薇藩逆；知妖焰之駭人，便欲裁近郊之牙閫。更可疑者，憲臣之望成於疏論，江陵舊相不肯奔喪而被廷杖旨也，乃舊相蒙後謚之日，正當憲臣出山秉憲之會。果前日之論是，則今日當為力爭以完自己之本色；果今日之蒙恩是，則前日何用抗疏以擅無窮之聞譽？豈學問亦堪阿世而會講總不越事情耶？內察在邇，憲臣以宿望之身處尊巍之位，日開一會講之局以號招天下，一時爭趨，竊恐賢者未必附，附者未必賢，陰為乘而顯為用，空善類而禍國家，所關匪細。⁵⁹

鄒元標的回疏則云：

但云致兩臣各去其官，得無以過庭訓、潘汝禎二人乎？臣正求之語言文字外，臣自為臺綱，似不必過為左袒也。以後先遲速之間，諸賢不安其位，得無以張慎言、安伸二人乎？慎言介特自持，不肯輕留，安伸臣奇其品，彼自過激，臣臺中資序，外人不得知，成規具在也。奴酋悔禍則已，如不悔禍，永平薊遼間不大，作磐石之基，臣不知所底，異日或有思臣言者，爾近畿開府可裁，不獨臣一人言也，至減慷慨言事者之心，欲借公道下石等語，臣茫然不知所對，不知誰氏。至謂勝敗不必分，功罪不必辨，今日正當滿眼敗局，罪當重而入者，爰書具在，臣何輕重之與有。張居正相幼主十年，昧人臣小心之義，取喪子亡家之禍，昔議其罪，臣非私意，今錄其功，臣付公論，此心如衡，不能為人輕重，必欲臣出一言，爭以成己之是，亦小之乎？眎臣而允厚未習臣深，臣實無此塵情也。且臣昔疏亦嘗偉其才、嘉其志，後在掖垣疏中亦言人情反覆，大學士于慎行大為擊節，六垣送臣文可查。⁶⁰

比較兩人的奏疏，稍可釐清雙方的爭議。郭允厚封奏疏中質疑了鄒元標幾件事：一、「語言文字之外，致兩臣各去其官」是鄒元標考劾過庭訓、潘汝禎之事。據實錄，天啓二年三月鄒元標考核云：「庭訓六年考滿，例應考查下河南道查覈，而汝禎考語有嶽峙淵涵，金和玉節語，以頌先聖者頌廷訓。況兩臣嘖有煩言，為臺中所不滿，臣等職總臺綱不敢不言，并乞敕下令，後臺中考語不得如前譽過其實，上命依議申飭。」⁶¹可見事由是過庭訓考期屆至，潘汝禎在考語上過於溢美，且兩臣「嘖有煩言，為臺中所不滿」，所以被鄒元標彈劾下臺。⁶²二、「後先遲速之間，令諸賢不得其位」比對鄒元標的奏疏，應是指御史張慎言、安伸兩人資序的爭議⁶³。三、「知妖焰之駭人，便欲裁近郊之牙閫」是指當時廣陵兵敗，鄒元標主張退守山海關，裁撤關外之兵鎮。

⁵⁹ 《明熹宗實錄》，卷二十七，頁1344-1348。

⁶⁰ 鄒元標，〈懇賜歸田疏〉，《鄒忠介公奏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81冊），卷五，頁36-37。

⁶¹ 《明熹宗實錄》，卷二十，頁1008。

⁶² 鄒元標申飭過庭訓、潘汝禎的奏疏可見：鄒元標，《鄒忠介公奏疏集》，卷四，頁37-38。

⁶³ 張慎言、安伸二人事，另可見：鄒元標，《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4-9。

四、「舊相蒙後諡之日，正當憲臣出山秉憲之會」則是指張居正追諡一事。神宗朝時鄒元標上疏抗言張居正奪情而遭廷杖，這件事是他政治生涯的起點，也是他後來名聲奠基之所在，但到了天啓還朝之時，鄒元標卻主張追諡居正，故被郭允厚批評「果前日之論是，則今日當爲力爭以完自己之本色；果今日之蒙恩是，則前日何用抗疏以擅無窮之聞譽」，鄒元標面對此質疑的回應則是一切秉公處理「昔議其罪，臣非私意，今錄其功，臣付公論」。

十月壬申，郭興治又上疏攻擊鄒元標：

元標諭御史馮三元云：是非不必太明。年來是非之不明多矣！而復倡之曰「不必太明」，將言官杜口，流品莫分，功罪可以糊塗，賞罰可以顛倒乎？臣有一喻，請無罪其不恭：佛教之旨，原以戒殺戒淫戒淫，今白蓮教俛頭，日日殺人擄掠，猶曰：吾奉佛奉法，死必生天也。今之講學者不幸類此。乞敕憲臣實實講孔孟真學，勿徒以口耳搖惑清議。⁶⁴

鄒元標回疏則云：

方具疏間，復見給事中郭興治一疏，臣始知是非不必分明語，為馮三元傳臣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即語之曰：往事再勿提。渠曰：是非卻要說明。臣說之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為愈，不謂臣欲他山之石，竟違浚恒之戒，臣之過失矣。省臣謂無是非之心等語，則無惻隱之心非人，又非孟子之語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為真心之是非，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謂熊廷弼失封疆乎？爰書具在也；謂三元昔時去國乎？則上已賜環矣。是非未嘗不明也。而臣所謂不必太分明者，亦未嘗不有當萬一。即方從哲一疏，滿朝以酖毒為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不必太分明之一証也。今廷弼所少者惟一處。廷弼處法不能獨處，如尚書，如侍郎，如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累累薰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皇上初登寶極，才二年所，老成守法，議獄緩處之意，非過也，非獨臣一人言，爰書末後語可繹也。⁶⁵

此次則是攻擊鄒元標「是非不明」，有違其都察御史職掌。鄒元標則回應說他所說「是非不必分明」是指對已經過去的政事就不要再反復糾纏爭執了，並舉了方從哲紅丸案及熊廷弼失守遼東兩事為例來辯解。這其實也反映了鄒元標年老後一反年輕時諫張居正奪情的衝動，而轉為一種較為圓融調和的態度。

由郭允厚與郭興治的上疏來看，講學本身已不是他們關心所在，攻擊的對象其實是鄒的人格操守。鄒元標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職，對於其人品操守的要求固然高，但究其真正的原因，正在郭允厚所說的「內察在邇」，擔心其「日開一會講之局以號招天下，一時爭趨」，進而導致

⁶⁴ 《明熹宗實錄》，頁二十七，頁1357-1358。

⁶⁵ 《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49-51。

「賢者未必附，附者未必賢，陰爲乘而顯爲用，空善類而禍國家」。

天啓二年爲壬戌，應行外察，隔年則爲癸亥，行京察，連著兩年考察，東林黨的人物還集結起來準備成立書院講會行號招，對魏忠賢等人來說，自是如芒刺在背。

在這幾波接二連三的攻擊後，首善書院講學的學者紛紛請辭。鄒元標、馮從吾數次請辭最終獲准，⁶⁶其餘人等如高攀龍、周宗建、何喬遠、葉向高雖上疏請辭未獲准，但最終書院講學是無以爲繼了。

天啓五年八月壬午(六日)，御史張訥上疏奏燬天下講壇：

伏乞敕下各省直撫按官，但凡有書院處所，盡數折改，將房屋田土逐一登報，亟行變價，解助大工，不許隱漏，其或見任官員有枉導會講，騷擾一方者，嚴加禁止。至若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位尊勢重，未經處分，恐根株不拔，引蔓牽藤，爲害更烈，乞聖斷施行。得旨：這都城書院作忠臣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尚未具覆，其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著拆毀，暨田土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本內有名，如鄒元標，少負忠名，出山僚倒，其身雖死已久，然臣姦依勢之惡尚存，著削了籍，仍追奪誥命；外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名雖假手理學，行無異乎市井，或通關節，而居之不疑，或躬窩主而靦顏無恥，甚至假仙惑世，吞產謀孤，讀至此，令人髮指，此三員都著削籍爲民，仍追奪誥命。⁶⁷

在鄒元標、馮從吾去職後，首善書院已改作忠臣祠。在張訥的上疏後，即行拆毀：「棄先師木主于路左。壁有記爲葉向高文、董公其昌書，並碎焉。」⁶⁸接著不久徐光啓將請改爲西洋曆局。⁶⁹

四

由以上兩個在明代政治史上具重要代表性的案例可看出，明代士人講學與政治之間的糾葛逐步加深的過程。靈濟宮講會之時，主持者包括徐階、歐陽德、聶豹等人，皆爲陽明學的提倡

⁶⁶ 《鄒忠介公奏疏》，卷五，頁24-67。《馮少墟續集》，頁746-750。鄒元標辭了六次方獲准，馮少墟則辭了五次。

⁶⁷ 《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二，頁2911。

⁶⁸ 孫承澤，《廣府廣記》，卷三。

⁶⁹ 崇禎二年徐光啓修曆時於首善書院故址建立曆局，入清後，傳教士仍居此修《時憲曆》，日後併爲天主堂，相關的歷史演化可參見：祝平一，〈〈御製天主堂碑記〉與清初的天主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2(2004)，頁390-394。

者，他們利用考察及會試之年，各地地方官及與試舉子咸雲集京師之際，舉辦講學活動，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士人來參與講學活動。而平時分處不同地域的陽明學士人，也藉此進行學術上的交流。

儘管靈濟宮講會規模極大，但我們也不可過於誇大了其在當時的作用，有幾個重要限制：

一、參加的士人雖多，但到底他們身分為何？（四方名士還是四方計吏？）⁷⁰是如何被動員的呢？檢視上面所提的幾次講會活動，「入覲」及「會試」是反覆出現的字眼，可以推想當年靈濟宮講會的大部分成員是接受考察的地方官以及赴京趕考的士子。⁷¹癸丑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同時舉辦外察及會試，所以參與講會的人數極多。

這些多是趁入覲、計偕之年參與講學活動的士人，我們很難評估他們對王學或當時政治局勢發自真心的關懷有多少。事實上在當時即有不少人批評這些參與講會的人用心不純：

階既尊信新建學，而其門弟子若尚書聶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眾，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為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歸咎階。⁷²

其時即流傳有一軼事，某貴臣欲籍講學謀高名，一日喝醉酒後由小吏送至講學之處，下馬後即席坐定鼻息如雷，眾不敢言亦不敢睨，至結束後仍由小吏領走，渾然不知何事。⁷³

二、在推動講學的重要高官不在位後，往往人息政亡，講會也迅速衰落。這也是京城講會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地方性質的講會，由於可獲得地方家族的支持，學者可透過親緣或姻親關係來發展其人際網絡，同時周遭地區的學者也多有往來，即便某地原來主持的學者赴其他地方或過世，也可透過其他鄰近地區的學者來維持講學活動的不綴，所以有些地方的講會可持續達百年之久。⁷⁴

靈濟宮講會利用京察來推廣講學之舉，也開啓了日後萬曆年間利用京察行黨爭的先聲。《明

⁷⁰ 「四方計吏」意指進京接受考察的地方官員。明制「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歲，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別致仕、降調、閑住為民者有差，具冊奏請，謂之京察。自弘治時，定外官三年一朝覲，以辰、戌、丑、未歲，察典隨之，謂之外察。州縣以月計，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以歲計，上之布政司。至三歲，撫、按通核其屬事狀，造冊具報，麗以八法。而處分察例有四，與京官同。明初行之，相沿不廢，謂之大計。計處者，不復敘用，定為永制。」《明史》，卷七十一，〈選舉志〉三，頁1723。

⁷¹ 李春芳亦有此說：「京師同志之會，每三年一大舉，天下之述職暨與計偕者咸與焉。」李春芳，〈存齋先生教言序〉，《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五，頁1。「述職」意指外任官員向朝廷陳述職守，「計偕」意指舉人赴京會試。

⁷² 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五，〈徐階〉，頁21。

⁷³ 徐學謨，《世廟識餘錄》，卷二十一，頁14。

⁷⁴ 關於王學士人如何與地方家族相結合來推行講會，可參見：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該書特別以江西的吉水、安福兩縣為例來做深入的個案研究，但須注意到的是，江西地區原是王學特別發達之處，而吉水、安福兩縣是王學「草根化」特別成功的例子，不能視作普遍的現象。一般地區的講學活動多依違在京城講學和吉水安福講學兩者之間。

史》云：

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至萬歷時，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察典，而群臣水火之爭，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傳中。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⁷⁵

而天啓年間的首善書院講學時，儘管主事者皆極力聲明他們意在講學不在政治，但由參與人員多為東林人士出身，以及成立時間在京察前一年的敏感時機，註定了他們無法擺脫政治糾葛的命運。

⁷⁵ 《明史》，卷七十一，〈選舉志〉三，頁1724。